大陆 深度

谁是大白：从暖心大白到“白色恐怖”，防疫权力将伸向何方？

“我像一个无情的扫码机器，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脸。”

2022年5月26日，中国上海，穿保护衣的消毒人员为同事调整口罩。摄：Ming De/Feature China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【编者按】上海封城的悲剧仍在重演。8月，三座热门旅游城市——海南三亚、新疆乌鲁木齐、西藏拉萨——先后爆发疫情，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“软封城”措施，曾仅见于一二线城市的核酸检测点，兀然出现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。随后，疫情蔓延至四川成都、广东深圳、贵州贵阳等数十个沿海和腹地城市。

诞生于疫情初期的“大白”，从居民歌颂感谢的对象，成为居民反抗防疫措施的冲击对象。“这是我们最后一代”自戕式的愤怒与决绝，并无力撼动当局清零的决心。从健康码、行程码到核酸常态化，面对致病性越来越弱的Covid-19病毒，为巩固虚幻的抗疫胜利叙事，中国政府正以牺牲经济和民生的代价，将所有人拖入疲惫和荒诞。

刘力峰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了。

这是刘力峰第一次摸到实体的白色防护服，一股新鲜感涌上身。不过，没人教他穿配白色防护服的步骤，他盯着不远处的医护人员，一边上网搜索注意事项，按部就班变身“大白”。他先在场地内消毒，用酒精消毒凝胶清洁双手，戴上口罩和帽子，将身体装进白衣，最后再套上一层手套、鞋套和护目镜。在白色防护服内，一呼一吸都变得不同，面罩因水气凝结起雾，让人看不清手机屏幕。

2022年3月，上海卷起凶猛疫情，刘力峰作为一名选调生公务员，在年初刚被派到浦西（注：上海核心地段，广义指黄浦江以西，是政治、金融、文化等重要区域）

热门头条

“天上有云、中间有网、地上有格”——中国监控国家的诞生 01

三十几岁 、“母胎单身”：没有恋爱为甚么就是问题？ 02

“国籍就像俱乐部会员卡”：解放军围台军演后，台湾人想移民吗？ 03

四川限电下的农村：断电的炎夏，村民在等待“国网” 04

国货取而代之？麦当劳、Zara和现代汽车离开俄罗斯之后 05

贵阳封控，贵阳转运：一场监视，服从和举报的大型社会实验 06

驻村基层锻炼。穿上白色防护服后，他负责协助核酸采样，扫描采集信息，日日与居民见面。有时，附近的居民会认出面罩后头的刘力峰，和他打招呼。更多时候，是刘力峰认不出别人，“我像一个无情的扫码机器，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脸。”

“大白”，诞生于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，彼时，特指身穿一身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，也是白色防护服的代称。由于全白、隔绝式的防护服鲜明、直观，穿上大白便意味着站在抵抗病毒的前线，民间和官方都不约而同用“大白”描述防疫人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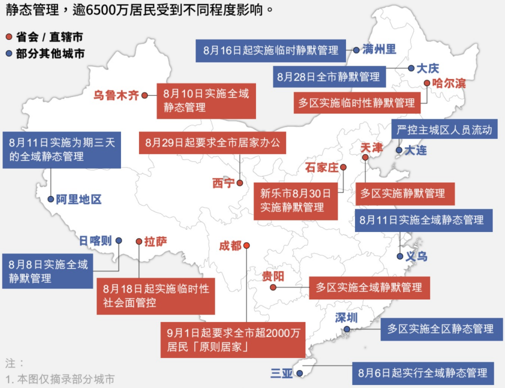
在疫情初期，一般只有医护人员会穿上大白。随着防疫政策层层加码，白色防护服内装着的身分也变得多元：政府公务员、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、警察、从社会招募的志愿者、雇用的安保人员，都有可能成为“大白”。

一开始，大白是抗疫的精神象征。人们对大白态度亲切，抱有寄望，积极配合大白的防疫工作。被严苛的防疫政策束缚逾两年后，大白与市民的冲突愈发频密地出现在公共视线中。有大白强行进入确诊者家中消杀，往私人物品、家私和冰箱喷洒刺鼻的消毒液；在街头，有宠物因主人被确诊，遭大白拍打致死；有人因在封控期间私自外出，被大白逮住削发，以示惩戒……

疫情覆盖超过1000天，更多的人成为了大白，更多的权力也握在了大白手上。

二十大前夕，中国大陆逾33城市实施静默管理

2022年8月至9月7日，中国大陆至少26个省市自治区、103座城市报告疫情，创下2020年初疫情以来最高纪录。**至少33座城市因疫情，实施部分或全部静态管理，逾6500万居民受到不同程度影响。**



注：
1. 本图仅摘录部分城市
2. 各地实施静默管理时间各有不同，个别城市已结束静默，部分城市的静默区域仍在扩大。

资料来源：财新、大陆各地疫情通报。（制图日期：2022年9月7日）

端传媒 Initium Media

变身大白

> 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（白色防护服）都是为了防疫工作。陈澄说，有人跟居委会套近乎，拿到一套白色防护服，偷偷溜出去办私事。“你穿上大白，跟关在那里的居民是不一样的。它就像一个通行证，这个感受是很普遍的。”陈澄说，“你怎么对待它（大白）、怎么去用它，这是很见仁见智的。”

刘力峰并不习惯那套包裹全身的白色防护服。

2022年1月，刘力峰硕士毕业半年，以选调生公务员身分调任到浦西的村委会。按

从丘吉尔、皇室到英联邦：英女王的七十年 07

坚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新首相特拉斯，能否带领英国走出困境？ 08

贵州一转运隔离人员大巴凌晨侧翻，27死20伤 09

林宗弘：921地震23周年——灾害频仍的台湾，如何成为韧性之岛？ 10

编辑推荐

当“大白”遭遇《宪法》——上海疫情中的法治假面 01

谁是大白：从暖心大白到“白色恐怖”，防疫权力将伸向何方？ 02

疫时集体焦虑、政治抑郁，我们和中国精神健康社工聊了聊 03

“最后一代”作为一种中国式抗争：没有行动的反抗能激起火花吗？ 04

频繁“翻车”的抗疫宣传：中国领导层是否陷入了“回声室危机”？ 05

上海疫情线上纪念馆：人们因什么而逝去？ 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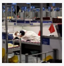
被核酸支配的生活，什么成了“新常态”？ 07

困在燕郊的人 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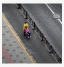
延伸阅读

“动态清零”与基层的迷茫：一位中国防疫志愿者的近距离观察

在次生灾害中休克的上海：Omicron之后，什么是理性的中国防疫模式？



失守与死亡：疫情中的上海养老院



从新疆开往上海的卡车：4000公里路，与一个女性司机的32年

疫情下被放逐的劳工：当上海成为他们的无依之地

被核酸支配的生活，什么成了“新常态”？

照安排，刘力峰将在村委会进行一至两年的基层锻炼。他把这份工作比喻成“体制内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”。初来乍到，他参与了工作培训、熟悉村里的情况，也参加党建活动、走访慰问和安全巡查等。三月前，防疫工作尚属轻松，例如疫苗接种，或当楼栋里出现密切接触者，他便协助卫生部门做排查和健康监测。

选调生 端百科

中国大陆公务员的一种，中共培养后备干部的制度。通常由中国各省党委组织从高等院校选出应届毕业生，下放到基层锻炼，工作几年后有较大机会升迁至领导职位。“大学生村官”是常见的选调生。

没想到，新型病毒攻破上海。刘力峰回忆，上海疫情刚刚爆发时，气温偏凉，穿上防护服不算闷热。但由于防护服全封闭，穿戴期间不能饮食和上厕所，仍充斥了不适感。每天经过四次消毒后，脱下防护服，刘力峰会突然被疲惫包裹，他的脸和手腕布满勒痕，手也起皱皮。

变身大白后，刘力峰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做核酸时采集信息。他意识到，穿上防护服时，自己的身分被暂时剥离，防护服代表了一种危机时期的需要，“穿上以后也会注意一点，觉得自己有职责在身。”只有脱下一身白衣，下班归家，才能回到生活中，与邻居打招呼和闲聊。

以刘力峰所在的村为样本，防疫人员主要由三类人群构成：第一，是镇上的卫生服务中心派来的医护人员，负责核酸采集；第二，由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，实行“就地转化”，全员参与前线防疫；第三，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，宣传招募居民志愿者，还有村委会的退休人员、工作人员家属等。大多数社区的防疫人员构成也相似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就地转化”在中国的基层防疫策略中是一种普遍的机制，往往反应迅速且具有强制力。在今年与上海几乎同时爆发疫情的吉林省，就采用“下层干部到基层报到”的政策，要求政府直属机关、企业和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，到社区参与防疫工作。不过，反响未必符合动员预期。吉林一位街道办（注：乡镇一级行政区街道的管理机构）工作人员透露，疫情之初，来社区报到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并不多。直到后来，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采取通报处分的措施，才多了些人，“他们是迫不得已来社区参加。”

除了就地转化，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参与了志愿者的工作。住在上海的李书婷，原计划在夏天硕士毕业后前往法国升学。在封城前夕，她以为只会短暂封控数天。李书婷无法忍耐无聊的居家生活，为了多抓住一点外出的自由，也为即将离别的城市作一点微小的回报，她通过街道办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成为了志愿者。

在大规模的疫情封控期间，临时志愿者的招募流程和标准各异。李书婷先在上海志愿者网实名注册，确认身份后，填写问卷等待筛选。问卷内容包括学历、工作背景和疫苗接种情况等。被选上的志愿者，由街道分配到不同社区工作。

社区也会自行招募志愿者。20多岁的陈澄是一名图书编辑，在上海生活，居家工作期间收到居委会的“邀请”。居委会联络社区内的年轻人，希望他们轮班帮忙，协助检测核酸、搬运物资等。这是陈澄第一次经历大规模封控，她没多思虑，立马答应了，“最开始疫情在武汉，你在远方看着，会有一种干着急的感觉，感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。但当事情发生在身边，你就会想，是不是能帮上一点是一点？”

2022
终于可以
吃到
家的味道

2022年5月7日，中国上海，一名穿保护衣的义工在封城期间为居民剪头发。摄：Yin Liqin/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

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（白色防护服）都是为了防疫工作。陈澄听说，有人跟居委会

套近乎，拿到一套白色防护服，偷偷溜出去办私事。“你穿上大白，跟关在那里的居民是不一样的。它就像一个通行证，这个感受是很普遍的。”陈澄说，“你怎么对待它（大白）、怎么去用它，这是很见仁见智的。”

在深圳参与防疫工作的政府职员柳桥告诉端传媒，在体制对外的宣传中，公职人员、社会招募的志愿者、保安等安保人员，这几类人都被称为“志愿者”，有时出于宣传需要，会单独把下沉干部拎出来称呼为“党员志愿者”。这些人大部分时候只需要普通著装，在进入有感染“风险”区域时才需要穿白色防护服，也因为被普通居民称为“大白”，两个名称各有语境，但志愿者与大白，基本上指向的是同一批人。

从“暖心大白”到“白色恐布”

张丽琼感到割裂，往日相处友善、温和的居委会工作人员，竟在封城期间面目全非，主动带着警察找上门。“他们不穿大白衣服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都是正常的。”张丽琼心想，或许因为面容被遮挡，无法再平等交流，“他们的权力是这个系统赋予的。 一个东西被赋予太多神圣的、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义之后，就会有很多人拿这个作文章。 ”

上海封城不久后，民间持续两年的抗疫疲劳被撕开了一个口子。新增病例持续高涨，物资分配的疏漏，防疫人员与居民冲突不断，让旧日备受吹捧的“精准防疫模范生”神话破产。在望不到尽头的清零战场，市民和防疫人员的摩擦如雪球般越滚愈大。

四月初，上海居民张丽琼的社区突然出现两户阳性病例。担心疫情扩散，张丽琼室友在微信群组发信息，号召社区其他住户不要下楼聚集做核酸，亦要求医护人员到每户人家单独进行采样。不少居民纷纷支持这个做法。

没想到，穿着大白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冲到张丽琼家门外，哐哐用力砸门，破口大骂，大声喊出屋内住户的个人资讯。张丽琼向门外的大白表示自己正在录音，对方只好作罢，骂骂咧咧地道歉并作出退让，“你们做核酸是个人的意愿，不做的话后果自己承担。 你们这些小年轻不要在网上乱发那些东西，知不知道？”

时至五月初，张丽琼室友已多次没有下楼做核酸。这一次，找上门来的队伍更庞大了。“一共十个大白，警察、街道、居委、志愿者全都来了。 两个警察和居委会的人进了门，我一个女生根本挡不住。”张丽琼气愤又无奈。后来，警察通过联络房屋中介，让中介通知张丽琼的室友做核酸，居委会工作人员还吓唬他们，“以后说不定不做核酸就是犯法了。 ”

这并非单纯的吓唬，2022年8月20日，海南省陵水县行政拘留了两名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居民，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。9月1日，江苏省南通市立案调查一个连续五次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居民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发文批评这类处罚，她指出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适用的情况是“紧急状态”下，而地方政府无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

张丽琼感到割裂，往日相处友善、温和的居委会工作人员，竟在封城期间面目全非，主动带着警察找上门。“他们不穿大白衣服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都是正常的。”张丽琼心想，或许因为面容被遮挡，无法再平等交流，“他们的权力是这个系统赋予的。 一个东西被赋予太多神圣的、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义之后，就会有很多人拿这个作文章。 ”

民间对大白的观感逐渐降温，不再如疫情初期那般。今年三月，网络流传为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员跳舞、以表感谢的片段。有的片段出现在学校，学生在操场为大白跳舞；也有身穿红衣舞裙的女士，在公共场合为排列整齐、站得笔挺的大白起舞。这些画面让不少人感到反感，人们批评这是让大白罚站、变相摆拍，大搞形式主义，其出发点仍是不要给大白添乱。

上海封城：市民被多名防疫人員追打，民眾不滿物資短缺，與...
稍後觀看
分享
上海封城
市民被防疫人員毆打
立即觀看：
YouTube

五月，浙江一所医院的核酸采样点，布置成土地庙的场景，屋内摆放了一个大白端坐其中，并附上对联“同心抗力扛疫情 大智大勇保平安”，横批为“康祥采样”。网友感到不安，认为这是在神化大白。“大消杀运动”也在多地兴起。穿上白色防护服的人员以防疫为名，强行进入居民家中消毒，有的甚至采取了撬门、翻窗入室等蛮横手段。然而，在官方口中，“入户消杀”却是“防控重要一环。”

5月11日，网络流传一则短片，一位居民称自己是阴性、拒绝被转运集中隔离，一位身穿白色防护服、胸前贴有“警察”标志的人士喝斥道：“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，就要对你进行处罚。进行处罚以后，要影响你的三代！”这位居民脱口而出：“这是我们最后一代，谢谢。”这则一分多钟的片段在网络激起千层浪，引起青年世代的共鸣。

当行政化盖过专业化

> 在庄琦看来，清零政策下基层防疫人员已经疲于奔命，“现在是纯疲惫，没有技术性的。”一个社会若要与病毒共存、且要压低死亡率，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、制定专业化服务，才能实现精细化治理。

一些看似机械、重复的防疫工作，运转起来远不如想像中有序顺畅。

刘力峰解释，在疫情期间，封控资讯需要接收到上层卫生机构的消息才能公布，具体的管理措施也得等待上层机构慢慢制定，再能逐步向下传达。这意味着，前线的下层工作人员只能被动等待。同时，为了避免“网上一些断章取义的误解和舆论”，在发布消息时，要谨慎地用官方口径解释。刘力峰说，居民时常得不到实时信息，便会认为村委会在隐瞒资讯，不少矛盾由此激化。

基层的防疫人员有如一块夹心饼干。

在刚刚落实封控的时候，医疗资源的分配成为火滚的矛盾点。许多慢性病患者或重大疾病患者希望外出就医，但被封控政策锁在家中，治疗被延误。刘力峰的村里也不乏这种情况，村委会在没有接获通知的情况下，便不能让患者出行，若引发冲突，就叫警察来调和。

除了就地转化的公职人员、志愿者等，警察也是大白群体的一员。警察的威慑力成为大白推动工作的润滑剂。刘力峰说，村委会工作的微信群组里，若出现言辞激烈、“看起来就要闹起来了”的场面，警察便会进入群组，“民警作为第三方解释，村民可能会更好理解。”

在吉林一个社区居委会工作逾十年的赵悦，对防疫工作中出现的资讯真空颇为无力。今年三月底吉林封控后，赵悦在办公室住了两个月。每天从凌晨五点，开始组织核酸检测，忙到昏天黑地，凌晨两三点才能收工。

对赵悦而言，不确定性是工作中的最大阻力。街道的物资总会杀个措手不及，就算到了下班时间，她也得帮忙卸货、搬运物资。如何转运阳性确诊人士和密集接触者，没有固定安排，经常需要等到深夜才进行。“每天来转运的人不一样，走的路线也不一样，具体什么时间能到我们这里，如果能提前半小时通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
”赵悦说，有时得等到凌晨两三点，转运的车才开到，四点半又得起身准备天亮后的核酸采样。

2022年4月9日，中国上海，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为村内的居民完成核酸检测。摄：Qilai Shen/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

赵悦的社区也不乏有在封控期间需要紧急外出的情况。有天深夜两点，一位居民敲响办公室的们，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，他需要出门去宾馆，“这也是一个特殊情况，我们写一个说明，他才能出门。出门有通行的卡口，需要说明才能放行。”若有人需要前往医院做透析，也需要由社区联系，安排专门接送去医院的车；有人需要买药，因为街上有卡口，也得通过社区帮忙。

政治学博士庄琦今年3月至5月在南方某省份担任防疫志愿者，足迹遍布多个社区和街道。庄琦认为，整体而言，防疫志愿者的人手是不缺的。但工作效率却被累赘的行政手段拖累。

他观察并对比两个邻近的国企单位小区。小区A经历了士绅化和中产化，引进物业管理，物资配送基本没问题。在小区B，出现了志愿者被多头管理，协调能力很差的情况。小区B的防疫工作由国企的志愿者“下沉”担起，更熟悉社区运作的街道和居委会无法指挥、调动这些来自国企的志愿者，“因为它不是一个建制（系统）的，”庄琦解释，“居委算什么？街道算什么？你是国企派下来的人，需要处分也是国企来处分。最后物资就送不上去了。”

在防疫工作中，相比于盲目投入人海战术，专业程度更为重要。庄琦以社会工作为例，广州在封控后，能很快掌握当地有多少失能的孤寡老人、精神疾病患者等，“广州的社工有很多经验是学香港的，”庄琦说，“因为社工一直跟进个案，手上有一套名单。”不过，庄琦也困惑，上海同样是社工经验比较发达的城市，但在上海封城水深火热的期间，却没有发挥出这一优势，许多老人在物资、心理甚至医疗上都得不到及时的支援。

“广东的社工一开始是复制香港模式。早期社工还不完全依靠政府资助时，还有NGO性质的运作。”庄琦说，现在社工被收编到高度行政化的体系，“社工变成行政工作人员。”原因是，现在社会工作由政府购买服务，“尴尬之处在于，街道购买服务，社工能不能做自己专业的事？比如出去做个案、小组、家访、定点人群服务，完全取决于街道如何看待社工，有的高度行政化，当你是办事人员。”有社工向庄琦表示，过去两年几乎没做过小组和个案，基本都在防疫。

在庄琦看来，清零政策下基层防疫人员已经疲于奔命，“现在是纯疲惫，没有技术性的。”一个社会若要与病毒共存、且要压低死亡率，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、制定专业化服务，才能实现精细化治理。“比如居家隔离，药品得怎么供应，有长期病患的人怎么和确诊人士做区隔，医院怎么安排……”庄琦指出，这些细节都需要有很好的设计，需要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（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）。

运动式的志愿服务

在清零政策的规制下，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资源和人力的使

> 用，有些（防疫）手段甚至只是一种表演，“我有什么手段可以用就用，比如在大街上消杀，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就很多。”一旦防疫运动常态化，“原本的短跑就变成马拉松，你得不断跑下去。”

志愿者的日常工作琐碎，每天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。若当天社区需要做核酸，志愿者会负责登记居民信息；社区需要做抗原检测了，志愿者便挨家挨户上门分发试剂盒；有物资或快递抵达社区，志愿者得帮忙搬运送抵居民门外。

“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等，”这是李书婷最大的感受。有一天，她穿配好白色防护服后，便从上午9点挨到下午1点，没事做，只好脱掉防护服吃午餐。一套防护服可以穿6小时，“感觉整个上午都白穿了，”李书婷说。

疫情程度和与居民接触的密切程度，决定了志愿者会穿哪种防护服。涉及核酸采样的志愿者，需要穿上大白，负责维持秩序或搬运物资的人，则会穿上薄薄的、防护服较弱的蓝色防护衣。在社交平台，穿着蓝色防护衣的人被叫为“小蓝”，有志愿者甚至戏称小蓝为“防弹衣”。若一个社区的阳性确诊个案太多，全部人都需要穿上大白。

2 8 号线
Line 2,8
Accessible Elevator
人民

2022年6月1日，中国上海，疫情缓和后，市内解封，一名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人来人往的车站看守。摄：Aly Song/Reuters/达志影像

在中国大陆，志愿者属共青团下属管理。在疫情之前，例如创建文明城市这种国家级的活动，便会动员志愿者参与。庄琦回忆，他在2010年左右做志愿服务时，还是用一个手写的小本子认证、盖章。逐渐的，志愿者服务也纳入数字化管理，你的志愿记录存放在那个小小的二维码内。每天开始志愿服务时，先扫二维码，结束时再签退。

“志愿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，官方想通过这套东西替代公民社会，要把这种志愿服务完全建制化。官方要主张一套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价值，大家都过来服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。”庄琦说，“现在有了这套数字系统，能够很好地推广，结合青年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来做这套东西。”

升级数字化管理的志愿服务，逐渐与校园奖学金、入团入党捆绑，成为中国年轻人绩优系统的一环。原本应该秉持自主的志愿活动，变成社会治理的一枚螺丝钉后，越来越“卷”。“有些大学，党员必须一学期达到24小时志愿服务时长。学生要显示出自己更积极、更热烈、更投身于社会服务，肯定得尽量多做。”今年庄琦做防疫志愿者时，观察到有的大学生会大老远跨区，到他所在的社区做志愿者，那些学生说“只能报名到这里了”。

“志愿精神本身是自主的精神，实际上却与数字化系统、个人的激励和国家动员，三者勾结在一起。”庄琦指出，“（防疫志愿者）不缺人，根本是抢着做。”

不过，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岗位不是总能得到热烈回应，尤其在资源更为紧缺的城市。上文提及的吉林省街道工作人员说，在封城期间，自己所在的社区只有三名固定的居民志愿者，但需管理2000多户没有物业负责的居民。因此，社区的志愿者团队大多由就地转化的基层干部组成。当防疫工作成为强制要求后，约有80位基层干

部来到这个社区，“我们有十几个网格员，再把这七八十人全部编排起来，勉强够用。”

网格员 端百科

全称网格管理员，是中国地方政府实施网格化管理、社区治理的具体事务工作人员，不具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身分，即无编制。网格员日常工作与居民直接接触，事务职责繁杂，薪资待遇低，人员流动较大。

这位街道工作人员留意到一位邻居，疫情爆发后每日早出晚归。他以为邻居工作忙碌，对方说自己正在另一个区做志愿者，负责在路上站岗，一晚收入能有200元，“咱们这区一分钱没有，我不可能在这做志愿者。”

许多人本是出于公益心，或抱持疫情尽早完结的心态，热心加入志愿者队伍。但在看不到尽头的疫情中，他们的好心被一点点消磨。庄琦遇到一些民营企业家，因为疫情没生意做，闲着来当志愿者，“他们实际上真的想帮忙，想把事情做好，会提很多意见，例如做核酸的桌子应该怎么摆放，”但这些热情的提议未必会被接纳。

在防疫志愿者的工作中，不时还得接住被量身订制的分外之事。得知李书婷是新闻学专业出身后，街道询问她是否愿意做宣传工作。李书婷感到荒谬极了，不想成为唱赞歌的喇叭，“志愿者是在封城时帮忙的。（宣传）这事又不急，为什么要做？”

李书婷尝试拒绝，但最后还是被要求拍照记录。有一次，一处教师公寓的居民排队做核酸，李书婷站在不远处拍照。一位女士走过来生气地说，“小姑娘年纪轻轻，不要为他们做歌功颂德的事。他们有什么理由让健康人一遍又一遍地出来做核酸？”李书婷尝试问对方的想法，被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把拦下。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打圆场，“你别理，她就是脾气怪。”

从事图书行业的陈澄也有类似的苦恼。在临近志愿工作结束前，陈澄被社区里的其他志愿者阿姨拉到一旁，大家商量着要给居委会主任写表扬信。在其他人眼中，陈澄是大学生，有文化，自然得担起重任。陈澄以忙碌为由，拒绝了这个提议。

“我觉得特别恐怖的是，那时所有事情还没有真正的结束，就已经开始想唱赞歌。”陈澄感到不解，“明明是你自己的正常生活被扰乱，然后被强行拉入一种新的秩序，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，你还要反过来谢谢他们。”

2022年5月31日，中国上海，封城期间，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在一辆货车上休息。摄：Aly Song/Reuters/达志影像

在庄琦看来，志愿服务属于运动式治理的一部分，官僚系统通过群众动员调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性，“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。”在清零政策的规制下，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资源和人力的使用，有些（防疫）手段甚至只是一种表演，“我有什么手段可以用就用，比如在大街上消杀，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就很多。”一旦防疫运动常态化，“原本的短跑就变成马拉松，你得不断跑下去。”

“大白本身是系统内部或下沉的人，招募来的志愿者大白未必会成体系化，但对人心是有塑造的功能。”庄琦说，“如果这三年都做这种事情，最后会不会影响到你和社区中其他人的日常交往？”

运动式远去，常态化来临

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后，半年间一直维持高频率的常态化全民核酸，即24小时至72小时一次。在深圳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柳桥，刚刚经历了9月3日至4日的“软性封城”。他总结，相比于半年前靠公职人员和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人海战术的方式，现在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常态化模式。

志愿者的生活没有展开多久，李书婷居住的楼里出现密切接触者。她被封锁，无法再外出。李书婷记得，四月某天夜晚，整栋楼的居民都下楼做核酸检测，那时仅有一户人家确诊。那天做完核酸，至少多了五户人家呈阳性。李书婷也感染了病毒，她认为群体性聚集的核酸检测是罪魁祸首，为了消灭病毒，却扩大了传染面。

与许多人一样，李书婷在确诊后没有马上被转运。她年轻，身体底子不错，在家隔离期间很快恢复健康。检测结果转为阴性后，防疫人员终于上门来，把她运到方舱医院。隔离期间，李书婷发现方舱内的志愿者也有人被感染。她的手机上还留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发来的文字通知，“你有权知晓，对于不转运的阳性个人，外区已实行永远红码，永不摘帽，下一步全市可能执行此项规定。”

李书婷在上海生活了六年。封控后，她决定在夏天提早离开，飞往即将升学的国家。她感到彻底的失望，“反正不会再回去了。”航班中转落地，身边的人们纷纷欢呼。李书婷觉得自己搭上了一架时光机，一觉醒来，“回到了没有口罩的正常世界。”

经历上海封城后，刘力峰度过了两个月堪比996的高强度抗疫工作，他说那是“实实在在有益”的事，“我扫的每一个码是能够服务到大家的。”网络上对防疫政策、蛮横执行的批评声音，没有打击到刘力峰的乐观，“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说法‘宁听骂声，不听哭声’。可能当我们身处疫情中，有时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做，觉得麻烦，群众会骂几句。不过宁愿听到群众不理解的骂声，也不要听到失去生命的哭声，因为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”他说自己仍相信国家，“希望国家能根据疫情形势，研判出更好的防疫办法。经济尽快复苏，大家生活更加舒心稳定。”

2022年5月23日，中国上海，封城期间，防疫人员穿上保护衣在街道上巡逻。摄：Aly Song/Reuters/达志影像

封控和封城的日子可以结束，但防疫和被防疫的人仍在不停运转。

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后，半年间一直维持高频率的常态化全民核酸，即24小时至72小时一次。在深圳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柳桥，刚刚经历了9月3日至4日的“软性封城”。他总结，相比于半年前靠公职人员和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人海战术的方式，现在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常态化模式。

“现在主要由处级干部带队，科级干部带小队，再配一名最低级别的公务员负责写材料。实际参与工作的是物业公司或保安公司招聘的大哥大姐。”柳桥说，真正由居民参加的志愿者已经很少。

现在当社区有很多人感染时，政府会先对接一家保安公司，招募、安排现有的保安，“搬运物资，搭建水马，看管楼栋及出入口，巡逻。”柳桥解释，等医务人员到场，配合他们上门检测、消杀的则是政府自己的工作人员。

柳桥估计，半年前深圳封城时，志愿者里保安和政府职员的比例是 5:5，如今达到 3:7 甚至 2:8。“现在已经是产业了。”他说。

核酸检测已成为新常态，不少志愿者却得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。赵悦失去志愿者的帮助后，工作量猛地翻了三倍。但她也理解，总要依赖志愿者也不是办法，“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，天天这样，谁也受不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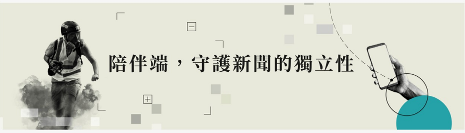
踏入九月，全国逾30个城市需要封控，估计约6500万人受影响，寸步难行。在静默中，无论是包裹着大白的人，还是挤在细长核酸队伍的人，人们的情绪值有如一锅逼近煮沸的热水。

9月4日，颇受年轻人青睐的社交平台小红书上，有用户发布了一张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士的相片，配文写到“帅气的大白”，贴文附上hashtag“共同抗疫”。留言说：“不穿这身或许更帅些”。

应受访者要求，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

全域静默　大白　上海封城　动态清零　疫情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
陪伴端，守護新聞的獨立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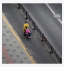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推出端 Plus 会员计划，邀请你们成为独立新闻的守护者，帮助我们守护端，也帮助我们继续守护各地独立记者，支持他们产出更多优质的华文调查报导。

延伸阅读

“动态清零”与基层的迷茫：一位中国防疫志愿者的近距离观察

在次生灾害中休克的上海：Omicron之后，什么是理性的中国防疫模式？

失守与死亡：疫情中的上海养老院



从新疆开往上海的卡车：4000公里路，与一个女性司机的32年

疫情下被放逐的劳工：当上海成为他们的无依之地

被核酸支配的生活，什么成了“新常态”？

© 2022 Initium Media